



## 难民·社区·认同

### ——近代天津犹太社区研究

杜佩红\*

自公元 586 年“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流散史。到 19 世纪末，欧洲一波又一波的反犹主义使得犹太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其中的一些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避难。上海、哈尔滨、天津、香港等地集中了大批来华犹太人，犹太人组成的社团成了这些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天津的犹太人人口密度仅次于哈尔滨与上海，虽然天津的犹太社区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但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天津犹太社区一直顽强存在。犹太人在天津建立了犹太会堂、银行、学校、医院等，还创办了自己的社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犹太社区，加上天津犹太公会有组织的领导，使天津犹太人一直维持着他们的民族特性。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犹太群体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上升，成为天津较有影响的社团之一。

自公元 586 年“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流散史。到 19 世纪末，欧洲一波又一波的反犹主义使得犹太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其中的一些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避难。上海、哈尔滨、天津、香港等地集中了大批来华犹太人，犹太人组成的社团成了这些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天津是仅次于哈尔滨与上海，犹太人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但目前关于中国近代犹太社区研究

\* 杜佩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比较丰富的是哈尔滨、上海。天津犹太社区则相对较少,且多数属于叙述性的<sup>①</sup>,其中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是目前关于天津犹太社会最为详细全面的著作。作者以记者的角度,对天津犹太人的生活作了详细的介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采访调查了曾在天津生活的犹太人,为我们了解民国天津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口述资料。<sup>②</sup>在本文中,笔者即引用了这些口述资料。笔者将围绕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社区犹太的生活及他们的民族认同来展开论述。

## 一、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

“犹太人在散居近2000年后仍能作为民族而存在,多半在于她的宗教和由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sup>③</sup>对于经常处于流浪状态的犹太人来说,在异国得以维系其民族传统,依靠的是犹太教和犹太社团,这在近代来华的犹太人中即可得到充分的体现。

自近代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后,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也夹杂其中,来到中国。天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便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吸引了一些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来津活动。“犹太人具有东西民族的习惯,对付环境,随机应变,头脑敏捷。旅居不久,即可与当地人士拉得非常亲切。从前我国对外侨居家营业限制不严,门户大开,外侨占种种便利,彼时我国商人又不能分出谁是英美德商,谁是犹太。同是洋商,而犹太人的手腕巧妙,各业均有其踪迹。跑合、经纪在皮毛、五金、报关等业中,均占有地位。”<sup>④</sup>加上天津英租界较为宽松的生活政策如允许犹太子女上学,这些犹太人便开始在天津购置土地,营造自己的生活基地。

根据天津犹太社会的发展历程,笔者将天津犹太人社区的形成大致分为三

① 最早对天津犹太社区叙述较多的是房建昌先生,房建昌先生基本上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天津犹太人的情况及犹太社团情况,详见房建昌:《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8页;房建昌:《天津犹太社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0页。之后对天津犹太社区有补充的叙述性研究较好的是《天津犹太社区及其经济社会生活》,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72页。

②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④ 《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怎样生存在世界上》,1946年10月16日《大公报》(天津版)。



个阶段:第一即是初创时期。最初来到天津的犹太人是居住在英国租界的俄裔犹太人。1901年天津划定俄租界后,犹太人便集中在这里。1906年,犹太人拉比吉利舍维奇在天津设立了犹太教会。不过这时的犹太教会只能租房作为公会场所,是一个小型的松散式宗教团体聚会。后因苏联肃清帝俄势力,其中犹太人的财产均遭没收,不得已开始向中国流浪。于是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犹太人逐渐增加,这时天津犹太教会才有所发展,成为当地犹太人最高自治机关。不过据曾生活在天津的犹太人爱泼斯坦<sup>①</sup>记述,直到1937年前“公会没有场所,只能租房充作教堂,约柜寄存在租来的房间里,逢年过节,才临时取出约柜供奉”<sup>②</sup>。与犹太教会同年成立的还有负责帮助贫苦犹太人的犹太公会(即天津希伯来协会)。1911年,天津犹太公会设立了慈善协会,救助孤苦贫困的犹太人。1925年,天津犹太学校成立,地址在旧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为解放北路)126号。学校大多数学生享受义务教育,学校的经费或来源于捐赠或为新年犹太人聚会中筹得。到1936年时,该校已有110名犹太学生和15名教师,图书馆藏书达2400册。这些组织的建立使得天津犹太人社区意识逐渐增强,为以后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即为建设时期。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定居东北的俄裔犹太人移居到了天津。“据30年代末期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天津犹太人约有3500人,是犹太人在天津人数的最高纪录。”<sup>③</sup>1937年离开天津的犹太人马丁·贝茨(Martin Bates)<sup>④</sup>也提到:“我在天津的最后几年里,犹太人口大量增加,他们一部分是从德国和奥地利来的,但大部分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从哈尔滨来的。”<sup>⑤</sup>如果说,之前的天津犹太人是以前俄裔犹太人为主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了很多其他国籍的犹太难民来到了天津,天津成为各国籍犹太人避难的重要城市。到1939年,天津有犹太人无国籍者800人,苏联籍250人,美国籍200人,德国籍150人,英国籍100人,其他国籍300人。<sup>⑥</sup>在犹太难民逐渐增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为犹太社区服务,富有的犹太人开始建立各种犹太社区的基础设施。犹太教会于1937年着手筹建会堂。1940年,犹太教会堂建成,地址在上海道14号(今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处)。这座会堂成为犹太人活动最集中的场所,记录着天津犹太人出生、死亡乃至嫁娶等诸事宜,目睹了天津

① 爱泼斯坦,1920~1937年曾生活在天津,是俄裔犹太人。

② 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邓新裕译,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刘晓航编著:《流散中国的犹太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④ 马丁·贝茨,1925年生于美国,1928年父亲因生意来到天津,1937年离开天津。

⑤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71页。

⑥ 参见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第52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犹太人人生的重大经历,结束了天津犹太人长期以来租借戈登堂举行宗教活动的历史。同年,犹太人还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在旧英租界24号路(今曲阜道)。作为在津犹太人文化娱乐与社交活动的场所,俱乐部拥有图书馆和剧场。图书馆藏希伯来文、俄文、英文书500册;剧场可容纳500人,经常举办戏剧、音乐会和舞蹈表演,此外还有餐厅、棋室、台球室等设施。犹太医院也是开办于1937年,地址在旧英租界66号街,主要面向犹太人,也收治中国病人,每天大约有上百人就诊。犹太养老院在旧英租界41号街,专门收养犹太孤寡老人。此外,天津犹太宗教公会还下辖犹太免费饭堂、犹太公墓等福利救济机构。可以说抗日战争期间,天津犹太社区反而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个阶段即为成熟时期。20世纪40年代,犹太社区已走向成熟化,影响力开始扩大,社会认同度也在增强,并开始纳入天津市政府管理范畴。1946年,天津犹太宗教会就被天津社会局要求申请备案。据1946年档案资料载,天津市警察局应天津市社会局要求派外警员对在天津犹太社团情况进行过调查。另外,这时期的天津犹太俱乐部还成为各界举行活动的场所。1937年落成后,犹太俱乐部即主办过天津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南大、南中、青星、了青、北宁、新学、义勇团及犹太八团体,计赛员七十二人”<sup>①</sup>。如天津中西女校校友会的举办也是在犹太俱乐部,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军政首长、社会名流、各国驻津领事、各国侨民、美国高级军官等六百人。犹太公会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sup>②</sup>。可见,犹太人社区不仅为犹太人自己的聚会场所,还成为天津各界的聚会场地之一,已变成天津有影响力的社区之一。天津犹太社区形成相对哈尔滨和上海来说较晚,但却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较多灾难的社区,是哈尔滨、上海社区在遭到破坏后,发展最为兴盛的社区。

## 二、天津犹太居民的日常生活

虽然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是在不同国籍的犹太难民涌入天津而形成的,但由于共同的信仰及行为,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聚集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圈。

犹太人初来天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生存问题。最初,由于天津门户开放不久,对外侨居住、营业限制不严,所以外商经营会有种种便利,彼时中国商人又不能分出谁是英、美、德商,谁是犹太。同是洋商,犹太人却相对手腕巧妙,因此很快在各行业崭露头角,尤其在皮货贸易上获得很大成功。到了天津沦

① 参见《犹太俱乐部主办乒乓球赛定期开幕》,1937年4月20日《大公报》(天津版)。

② 参见《津犹太俱乐部昨晚一盛会》,1947年3月29日《益世报》(天津)。



陷期间，侨居津市的英美各国商人，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都被集中在潍县，天津市场上最活跃的白种人多半即是犹太人，从而使得天津犹太商人获利颇多，这为天津社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天津犹太人提供了消费场所及就业机会。爱泼斯坦回忆道：“天津犹太人的日常所需都可以在犹太人开的食品店、熟食店、面包房、乳品店买到。他们去犹太人开的饭店、旅馆、医院、药店、珠宝店消费，其他生活需要，他们也总是去找犹太人。”<sup>①</sup>天津犹太人塞穆尔·米勒<sup>②</sup>也说：“犹太人的公司和店铺充斥大街小巷，很好找工作。”<sup>③</sup>

犹太教信仰是维系犹太人民族文化意识的最重要的纽带。犹太教教律规定要开展日常宗教活动，负责在津犹太侨民的登记，记录并主持犹太人的出生、婚配、离异、死亡诸事宜。即使在犹太宗教公会堂没有建立起时，天津“大多数犹太人还是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赎罪日禁食，在逾越节吃无酵饼，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他们去参加宗教仪式。由于那时没有宗教场所，每逢重要节日，他们通常租用英租界戈登堂的大厅，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出席，大家互赠礼物，品尝各家带来的食品”<sup>④</sup>。索尔·布禄林<sup>⑤</sup>也讲到，“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要和他的曾外祖父一起去做礼拜”<sup>⑥</sup>。

天津犹太人在解决了生活问题和参加完宗教仪式活动后，还有自己的娱乐休闲活动。1928年创立的天津犹太俱乐部是天津犹太人主要的娱乐与社交中心。俱乐部取名为“昆斯特”(KUNST)，该词来自德语，意为“艺术”。起初，俱乐部十分狭小，后来犹太社团筹集了14万大洋购买土地和扩建了俱乐部。新俱乐部内有一个拥有500个座位的剧院，还有一个藏有5000册意第绪语和俄语图书的图书馆，读者可以在那里的阅览室读到世界各地的报纸。新俱乐部有餐厅、咖啡馆和小酒吧，还提供扑克、台球、棋牌等娱乐设施。俱乐部丰富的娱乐休闲设施为犹太人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生活趣味。<sup>⑦</sup>本杰明·卡布宁斯基<sup>⑧</sup>回忆儿时

①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16页。

② 塞穆尔·米勒，1928年出生于天津，1947年离开天津。其父母是波兰籍犹太人，父亲1905年在哈尔滨从事会计职，1925年举家迁到天津。

③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34页。

④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14页。

⑤ 索尔·布禄林，1921年生于天津，1939年离开天津赴美。外祖父曾在1920年应天津犹太社区之邀举家从哈尔滨到天津，出任拉比。

⑥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209页。

⑦ 参见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⑧ 本杰明·卡布宁斯基，1919年生于苏联，1924年迁到天津，1936年回到苏联。舅舅利奥·格申维奇曾是犹太社区领导，母亲是犹太学校理事会成员。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生活时提到：“我经常去天津犹太俱乐部，孩子们常去参加那里的各种音乐会，我最喜欢去的是俱乐部的图书室。”<sup>①</sup>在教育上，对于天津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犹太学生都得去犹太学校学习，有些富裕的家庭可以选择去美国或者英国等学校接受更好教育，但对于大多数贫困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是将孩子送到犹太学校学习。在宋安娜所采访的天津犹太人中，很多即是在犹太学校学习过的。当然福利设施方面，犹太社区也十分全面，有医院、养老院、公墓等。一些来天津避难的犹太人就是由于这些完善的设施，逐渐在天津定居下来。如科特·维尼拜斯，1928年生于奥地利，1941年来到天津。起初刚到天津时，他们和大约十家犹太难民住在一起。房子在犹太医院后面，一家人有一个房间。一年后，他们在之前来到天津的哥哥帮助下，做起了修表生意，并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一个小公寓，之后科特还进入犹太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sup>②</sup>

由此可见，较为完整的天津犹太社区，为来津的犹太人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大多围绕社区来展开，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就本身而言，犹太社区主要由自己经营。他们食用习惯的犹太及东欧食品，并且经常从当地的食物杂货商那里购买食物。社区里有犹太修表匠、宝石匠，专做高档风格的西服裁缝和做鞋子的鞋匠，还有犹太人经营的药房，犹太医生和牙医，一家中级犹太医院，犹太理发厅和美容店，为犹太穷人的慈善机构和无息借贷社，一家小型的犹太银行，一家为犹太死者办理传统丧葬服务的老人组织等。犹太人的社会活动大多在犹太艺术俱乐部进行，这里有业余的演出，不同主题的讲座等”<sup>③</sup>，“他们几乎完全生活在犹太人的圈子里”<sup>④</sup>。

### 三、天津犹太社区与犹太人的身份定位

“虽然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就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民族意识，相反地，他们在大流散过程中最为珍惜的就是他们强烈的民族、家族意识。”<sup>⑤</sup>对于多灾多难、习惯流浪的犹太人来说，“社团是犹太人散居生活状态下可以依靠的群体，发挥着相当政府的职能。由于犹太社团的存在使得犹太人既

①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45页。

②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200、205页。

③ 宋安娜主编：《犹太人在天津》，邓新裕译，第3页。

④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116页。

⑤ 高迪迪：《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保持与传统的联系,又保持自身的内部认同和独立性”<sup>①</sup>。正因如此,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身份认同,而不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之认同。

天津犹太社区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欧洲反犹太主义的产物。最初俄裔犹太人来到天津,大多居住在英租界一个小白楼,之后他们依托租界宽松的政策很快在天津稳定下来,其中一些人还成为皮货商富翁,还有一些成为代理商、经纪人、公司雇员、医生、教师、工匠、自由职业者,这不仅有利于犹太人建立自己的社区,还为社区生活提供很多便利。特别是二战期间,一些难民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来到天津,很需要同胞的救济来维持生活。<sup>②</sup>天津犹太社区的建立发展恰为这些避难的犹太人提供了日常所需的食品店、熟食店、面包房、乳品店、饭店、旅馆、医院、药店、珠宝店等等。

在天津犹太社区中,处理在津犹太人日常事务的综合性组织是天津犹太公会。该公会从1906年建立后,从未间断过,一直着眼于为犹太人服务。随着天津犹太社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天津犹太公会也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运作体系。从宋安娜提供的天津市档案馆“1945年天津犹太教公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来看,天津犹太公会设有常委,主席、副主席、秘书3人,其余14人为委员。犹太教公会下设六个附属机构,附有管理委员会,又有委员会负责人若干名。<sup>③</sup>此外,公会还有自己的章程,从1948年2月17日该会呈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的公会章程看,其内部管理较为严密,其宗旨是“致力于天津地区犹太人宗教文化之信仰与需要,并对生死、结婚、离婚,遵守当地之法律,按犹太法规及习惯主持举行”。会员由“超过二十岁之犹太教人,不论其性别及其公民身份如未曾受到法律之裁判者”组成。会员享有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复决权及提出议案的权利,当然还有一些基本的义务。会员大会每年4月间举行一次,是犹太公会最重要的会议。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公会是否真正举行过会议及会议举行的真正过程。但从简章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出天津犹太公会与政府职能相类似,规定了会员资格以及一些权利和义务。虽然天津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国籍属性相当复杂:即使同为俄裔犹太人,“既有在天津居留几十年,生儿育女产生第二代侨民的俄籍商人,也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天津并失去国籍的无国籍人士;同为二战难民,既有住高级公寓生活优裕的富有者,也有身无分文,

① 张淑清:《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及其历史作用探析》,《犹太研究》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② 参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③ 参见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30~31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靠小手艺、小技巧勉强糊口的穷人，但他们都有同等的资格和同等的权利和义务”<sup>①</sup>。

在犹太公会的领导下，天津犹太社区的民族凝聚意识更为强烈，身份认同感更强。1929年耶路撒冷发生教案，“在巴里斯坦之犹太人，受损失最巨”，天津犹太社区就通过犹太公会表达对耶路撒冷同胞的关心：“本市犹太人公会，召集全市犹太人，在英租界中街十八号格熙维公司开会，讨论救济方法，旋先推选五人，组织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耶路撒冷之犹太人。”<sup>②</sup>虽然犹太人散居各处，但他们一直将以色列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和归宿。1947年以色列复国，“津市犹太人齐集曲阜道犹太俱乐部，举行盛大庆祝会。台上高悬犹太建国领袖喀里森画像。当场由津市犹太公会主席皮索诺维琪宣读其致巴力士坦本土之贺电后，全体群众即高呼犹太万岁，痛饮狂欢，音乐声中男女老少相抱而舞，达一小时之久”<sup>③</sup>。这充分表达了天津犹太社区民众的民族意识。曾在天津生活过的犹太人伊莎贝尔·梅纳德在自己回忆录《中国梦：在天津长大的犹太人》就提到：“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在历史的情况下，我们在思想上狠狠地抑制了我们通过突出社会内部联系在外国的事实。我们有自己的学校，我们的俱乐部，我们自己的组织和商业。作为中国的俄裔犹太人，我们是第三类的存在。”<sup>④</sup>索尔·布禄林也认为：“犹太社区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区，我们基本负担不起什么东西。然而它是一个很有组织的社区”，“我们有我们的主席，20年代的查施特敏克夫先生，30年代的格申维奇。我们有犹太学校，我们信奉犹太教。我的好朋友莫斯·莫尔金和他的家人执行犹太宗教仪式。我们的文化生活围绕犹太俱乐部进行，我们的宗教生活围绕犹太会堂。我们的教育生活围绕我们的学校”<sup>⑤</sup>。在天津，最能体现犹太人民族主义观念的是锡安主义。锡安主义理论提倡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主张返乡复国。这种主张最先在俄国与东欧得到响应，这与当时沙俄强烈的排犹主义有关。张倩红认为：“锡安主义为危机中的犹太人提供了价值认同，既保留了传统犹太教的感召力，也顺应了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的冲突。”<sup>⑥</sup>天津犹太社区以俄裔犹太人为主，因此锡安主义也较为兴盛：“锡安主义思想在天津犹太人中就很有影响，在天津犹太

①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43页。

② 《本市新闻：津市犹太人，拟售资救济其巴城同胞》，1929年10月23日《益世报》（天津）。

③ 《津犹太人庆祝复国》，1947年12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

④ Isabelle Maynard, *China Dreams: Growing up Jewish in Tientsin*,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6, p. 2.

⑤ 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第215、220~221页。

⑥ 张倩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社团中,天津犹太人中最活跃的、最有影响的是两个青年锡安主义组织——‘贝塔’和‘马卡比’,它们和上海、哈尔滨的这两个组织一样,均积极组织文体活动和准军事训练,讲授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对犹太青年灌输锡安主义思想,培养他们的认同感和团队意识,‘贝塔’还组织犹太青年移民巴勒斯坦。”<sup>①</sup>在这种思想理论下,天津犹太社区更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 结 语

近代以来欧洲不断的反犹政策,促使其犹太难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在哈尔滨、上海、天津、青岛、香港等地稳定下来,并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社区,虽然天津犹太社区的发展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但因天津特殊的环境政策,使得天津犹太社区一直顽强存在,并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天津较有影响的社团之一。他们聚集在天津,在天津建立了犹太会堂、银行、学校、医院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犹太社区。天津犹太公会的领导加上社区的完整性,使天津的犹太人保持有明确的民族认同,他们一直关注着中东地区局势,为以色列复国奠定了基础。直到1958年6月30日,天津只剩下32名犹太人,天津犹太公会也在这一年正式解散<sup>②</sup>,曾经的天津犹太社区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sup>①</sup> 刘晓航:《流散中国的犹太人》,第153页。

<sup>②</sup> Herman Dicker,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Twayne, 1962, p. 150.